

浅析方志学学科建设及 方志学专业在高校的发展路径*

沈松平

提 要：地方志编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方志无学”的传统偏见使方志学学科建设和学历教育相对滞后。方志学定位为历史学（中国史）的二级学科在今天已无意义，可以考虑成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或与图书情报和档案管理合并为“图书情报与方志档案管理”。无论是否有官方名分，校地协同都是打破目前高校方志学专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方志学 学科建设 学历教育 校地协同

方志学学科体系的讨论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轮修志，但学科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还是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① 2010年4月，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了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论证会。2012年12月，又在北京召开《方志学学科建设三年规划（2014—2016）》研讨会。2014年4月，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学科建设的要求更为明确：“要逐步构建科学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尽快制订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逐步建立学科带头人制度。……继续争取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加强与高校、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联系，设立方志学专业，招收、培养方志学研究生，不断提升方志学的学科地位。”^② 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③（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成熟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其中对学科建设的近期要求则是“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规划纲要》的出台，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地方志工作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全面转型升级。地方志事业包括方志学学科建设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组长陈奎元的话说就是“现在又是具备条件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的大好时机”^④。笔者拟就方志学学科的定位、体系构成，以及方志学专业建设在高校面临的困境、发展路径，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与学术界同仁商榷。

* 本文为浙江省2015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校地协同培养社会适用性人才之个案研究——方志学专业（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jg2015049）研究成果。

① 参见朱佳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促进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②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③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9期。

④ 陈奎元：《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第153页。

一 关于方志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地方志编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受“方志无学”传统偏见的困扰,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学历教育目前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迄今为止,方志学只被承认是中国史(一级学科)下面专门史(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三级学科,尚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学科目录。笔者曾撰文建议将方志学定位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中国史)下属的二级学科。^①但鉴于2011年以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只分列学科门类 and 一级学科,对二级学科已不作规定,而改由各高校自主设置,所以再将方志学定位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中国史)下面的二级学科,既无增列进入学科目录的操作可能,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那么,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能不能在历史学门类下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并列为一级学科呢?这恐怕也是目前方志界呼声比较高的一种提议。但这样做意味着方志学要从依附史学的地位中“脱胎”出来,剥离历史学(中国史)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笔者认为这种提议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即对方志学与中国史之间的区别,^②目前尚无法提供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说明和论证。

持这种提议的人通常给出的理由是:方志是综合性的著作,其内容丰富,已非某一门学科的知识所能涵盖,因此方志学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容纳的新学科。这个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它把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混为一谈,因为今天史学的范围和视野已远非传统史学可比。自20世纪初西方“新史学”诞生以来,史学研究已大大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框框,由原来注重研究政治军事史,扩大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心理、性格等,强调历史的综合研究、总体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强调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因为光靠历史学本身的知识已解决不了历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必须结合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信息学等进行综合研究。方志的综合性这一特点不仅不能成为它脱离史学范畴的依据,反而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史学发展的趋势,并全面说明要编好一部志书,必须吸纳来自各个学科的人才,只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才能修出一部可传之千秋的名志。持这种观点的人又认为,史书以记载过去为主,方志以记载现状为主,这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现状时时在变化,并很快会成为过去,古今志书从所记内容来看,都是以记历史为主。还有人为证明方志学独立于史学之外,提出“史发议论,志不发议论”^③,以此区别方志学和历史学(中国史)。然而“史发议论”只说到了史书的一种,并不能概括不发议论的实录体史书,所以这是一个虚假判断,自然不能作为方志学从历史学(中国史)中分离出来的理由。

至于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④一书中首列方志学门类,作为清代学术的11个门类(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之一,与史学相并立。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对清代学术的总结,故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方法,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以西方

① 参见沈松平:《方志学专业建设在国内高校的历史回顾、框架设计及未来走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8期。

② 按,方志学如果只是设置为历史学(中国史)的一个二级学科,只需说明其与中国史下面其他单个二级学科如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的区别;但如果设置为与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就需要说明方志学与历史学(中国史)的区别。

③ 翟光:《论方志学的“独立”地位及发展途径》,《广西地方志》1988年第1期。

④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学科为分类标准的学术分科,即以研究主体为分类标准,以学术观点及内容来分门别派,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分科标准。近代中国受西方分科立学、分科治学、学务专门理念的影响,逐渐采用西方学科分类标准。至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并沿用至今。中国传统之经学、诸子学等国学,其内容经整理后也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方志学即便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算得上一门与史学并立的独立学科,但也不能因此推定在今天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中就应有相同的地位。

那么,方志学是不是就不能够成为一级学科了呢?笔者认为,《规划纲要》的出台,使地方志工作由原来单纯的修志编鉴向一项事业转型升级,从“一本书主义”向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转型升级,给方志学学科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可以尝试跳出历史学的框框来思考问题,不纠缠于志书本身,从“用”的角度来思考方志学学科的定位,将其纳入管理学门类,成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地方志工作的主业当然是修志,修志的最终成果表现为一本志书,它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功能。但存史功能只是方志的原生性功能,在使用前还只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出来,因此志书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价值还是“用”。修志的目的在于用,育人和资政就是志书经使用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功能。方志与其他文献最大的不同是官书、政书,因其是目前记载地情资料最全面、最丰富、最客观的文献典籍,有辅助治理的功效,隋代以来一直将其列为官书,作为资政辅治的工具,为历代政府所重视,其资政辅治功能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近几年来,方志的资政辅治功能在政府的力推之下,日渐凸显。

2014年4月16日,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①2015年12月28日又再一次批示:“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各级政府都要关心和支持地方志事业发展,也希望地方志工作者继续发扬方志人精神,志存高远,力学笃行,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②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也强调:“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各级党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地情,了解地方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地方志开发利用水平是衡量地方志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要把地方志工作变成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要学以致用、修以致用。……地方志开发利用做得越好、推广得越多、运用得越广泛,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就越重大,贡献就越大。”^③

李克强总理的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讲话都强调修志为用,尤其是志书的资政功能,能够提高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执政水平,这是今后地方志工作的方向。方志的价值和活力在今天而言,已不仅仅局限于修志存史,更在于育人与资政,在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伴随着地方志事业的转型升级,方志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渠道得到大大拓展,必将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①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②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

③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

围绕“用”字做文章,将方志学纳入管理学门类,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可以考虑将方志学同现有学科目录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并列为管理学门类的一级学科,甚至可以将方志学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合并为一个一级学科。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情况说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是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构成、采集、开发利用、管理规律的科学,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分析、出版管理等若干具有相同学科使命和共同理论基础的学科的集合,其使命是探索蕴藏于各种信息记录中的信息资源价值实现的规律性,以有力的科学管理放大信息资源的功能效用,实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构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群的若干学科方向各有自己的具体研究对象,各有自己需要探索和遵从的具体专业规律。但在本质上,这些具体对象同属信息资源,这些具体规律同属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规律,因此有着共同的基本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随着方志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加快,地方志工作与图书馆工作、档案工作和情报工作已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融合发展态势,可以归属到信息资源管理范畴之内。因此方志学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群合并顺理成章,合并后的一级学科名称可以考虑改为“图书情报与方志档案管理”^①。

方志学学科定位明确之后,接下来就是构建方志学的学科体系,也就是说应有若干个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一般应有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方志界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的讨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两分法体系、三分法体系、四分法体系、五分法体系、六分法体系、七分法体系、八分法体系、九分法体系、十分法体系、多层次体系10种。如此众多体系的出现,说明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在业内迄今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更没有建立起被学界认同的学科体系。牛润珍曾撰文指出方志学学科体系应当包括9个分支:一是方志发展史,包括志书纂修史和方志学史;二是方志学理论,包括方志学原理(即方志哲学)、方志学基础理论等;三是方志编纂学,包括编纂原则、宗旨、体例、体裁、篇目架构、资料搜集、文字表述及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部类撰写方法等;四是方志文献学,包括方志目录、综录、提要、旧志辑佚与整理等;五是方志管理学,包括志书编纂法令法规、业务指导、行政管理、社会参与等;六是志书及资料管理、收藏及应用,包括方志馆建设、数字化等;七是国外地方史志编纂与研究;八是中外地方史志交流与比较研究;九是年鉴编纂与年鉴学。^②笔者比较赞成牛润珍的观点,除谱牒学外,方志学学科体系所包含的内容皆已囊括。但如果申报一级学科,方志学下面当然不可能设置9个二级学科,上述内容还是可以适当归并。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一级学科方志学下设置方志学理论与方法、方志应用与管理、方志发展史、中外地方史志交流与比较研究4个二级学科。因为方志学作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申报,必须突出方志的使用,则方志应用学独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毋庸置疑。方志文献学可以归入方志学理论与方法,方志编纂学可以单独设置为一个二

① 按,学科与高校研究生专业的设置是一一对应的,但与本科专业的设置则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比如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目前包含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独立的本科专业。如果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中改称图书情报与方志档案管理学,那么目前的3个本科专业就会变成4个,新增一个方志学本科专业;而研究生专业名称也会相应地改为图书情报与方志档案管理专业,成为几个独立学科组成的联合体(几个学科之间必须是并列关系),同样可以凸显方志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② 参见牛润珍:《略论方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级学科。但考虑到在管理学门类申报一级学科,应突出志书的开发利用与管理,不应突出志书的编纂,也可以将其内容归并到方志学的理论与方法。至于年鉴编纂与年鉴学,虽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已经是地方志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年鉴与方志从学术层面上来说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各具特色的地情文献,方志学无法包含年鉴学,如果硬要在方志学门类下设置年鉴学,在学术层面上将无法进行科学、严密的论证,反倒给申报工作徒增麻烦。因此,笔者建议将年鉴编纂与年鉴学的内容归入中外地方史志交流与比较研究,因为年鉴与方志有一定相似性,可归入类似方志文献一类,又因年鉴是西方的舶来品,自然属于中外文化交流序列。年鉴归并到中外地方史志交流与比较研究顺理成章,既保留了年鉴学的内容,又避免了因冠名而引起学术争议。此外,谱牒学也应该是方志学学科体系中的内容,宗谱、族谱、家谱乃一姓一族一家之史,年谱即一人之史,与方志同为华夏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但同样考虑到在学术层面会引起争议,故不在二级学科中加以体现,但今后高校方志学专业在课程设置时,应当考虑增设谱牒学。

二 方志学学历教育在高校发展的回顾及困境

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学历教育)的基础,但反过来,专业建设又是学科建设的基地,即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提供基地。没有专业建设为依托的学科建设,其发展前景很不乐观,甚至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高校方志学专业学历教育的有效健康开展,将有助于方志学学科的确立和完善。

方志学专业的学历教育可追溯到1983年4月复旦大学历史系招收的两年制方志大专班。该班最后半年在杭州师范学院学习,1985年2月毕业,获得杭州师范学院颁发的方志学专业大专毕业证书。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也招收了一届两年制的方志学干部专修班,学员从当年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成绩合格者中录取,毕业后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方志学专业大专毕业证书。^①这可以算是方志学有学历教育的开始。其后方志学本(专)科专业在高校的发展出现了一段空窗期,直到1997年8月在宁波举行的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提议,“利用浙江和宁波有优良的修志传统的优势,在宁波大学建立起方志专业,为培养二十一世纪修志人才做出贡献”^②。浙江省教育厅随即批准宁波大学历史文化系于1998年起面向全国招收方志学本科专业学生。^③迄今已毕业13届,其间虽因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变更,有3年没有招到学生,但宁波大学的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一直坚持至今。魏桥曾说:“1998年宁波大学在历史系专设方志专业,并在全国统一招生,实属创举。”^④而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目前国内尚无高校设置方志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仅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宁波大学、扬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在或曾经在中

① 参见《北师大开办方志学干部专修科》,《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

②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56页。

③ 1998年创办时,浙江省教育厅的批文是批准宁波大学设立历史学(方志学)本科专业,显然是作为专业来建设的;但2000年以后由于宁波大学实行教学改革,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实施了“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平台按一级学科招生,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思路,模块由具有专业方向特色的课程组成,实现专业的分流培养,体现“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特色,方志学专业遂降格为历史学专业的一个方向(模块)。

④ 韩章训:《普通方志学》,魏桥“序”,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国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等硕士学位点下设置方志学研究方向,招收硕士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分别在中国史、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学位点下设置方志学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另据骆伟介绍,1987年他在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也招收过两名方志学(含地方文献)方向的硕士生。^①辽宁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也开设过方志学课程。

回顾高校方志学学历教育3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国内高校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首先,缺乏官方名分。方志学迄今为止还只被承认是一个三级学科,没有被列入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和教育部高教司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由于缺少官方名分,方志学在高校的发展一直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不像其他成熟学科那样有保障,可以纳入高校正常的学科(专业)发展轨道,因而呈现出偶然性大、稳定性差、游离于高校正常学科(专业)发展轨道的特点。如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方志学专科均只办了一届;四川大学、扬州大学分别设在历史地理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点下的方志学研究方向,也只坚持了几年就取消了。国内高校中至今尚没有方志学专业的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只有个别高校在历史学的其他硕士点和博士点下设置了方志学研究方向。虽然目前教育部对于授予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目录已不作规定,允许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理论上存在高校自主设立方志学硕士点(学术型硕士学位点)的可能,^②但实际操作起来,比在目录内增列二级学科难度要大得多。何况目前国内高校专业大多是理工科当家,对文科不重视甚至忽视,而文科出身的专家也大都认为方志学是“小学”。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申报目录外二级学科,困难可想而知。方志学专业也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纳入学校正常的学科(专业)发展轨道,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能办有毕业证书的硕士研究生班,进入21世纪以来则无法申报专业型硕士学位点,而只能举办一些仅颁发结业证书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即使是宁波大学的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其颁发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也只是注明历史学(方志学)专业。

其次,师资缺乏。由于方志学缺乏学科的稳定性的,在课题、成果、评奖、聘岗、考评、职称等现实问题上存在“短板”。国内高校中基本无法形成方志学学科团队,年轻教师进入高校后,很少会从事方志学研究。某些高校方志学学历教育开展得相对较好,也仅是这些学校有个别教师在从事方志学教学和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高校开设了方志学课程,但截至目前,高校中开设方志学课程的屈指可数。所以就高校而言,无论是教学还是学科建设方面,方志学专业的师资是严重短缺的,而且这种短缺跟其他正常学科(专业)的师资不足还有很大的区别,即不太可能通过人才引进来解决。

再次,实践与教学并举真正落到实处有待提高。实践教学是连接知识、能力与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当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关键点,但同时又是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其在高校发展中的木桶效应依然突出。方志学专业是一个实践性相对较强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因此实践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高校方志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以及毕业实习,包括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各地方志工作机

① 参见《骆伟访谈录》,《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2期。

② 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专业型硕士学位点的设立仍需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3月发布的《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为准,不存在目录外自主设置一说。

构的积极支持,使实践教学能真正落到实处,并呈可持续发展,真正融入方志专业的教学体系之中。

三 校地协同是打破高校方志学专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

要摆脱高校方志学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获得教育部给予的名分,争取列入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或是作为基本专业列入教育部高教司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这就意味着方志学要成为一级学科,是方志界、社科界、高校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只要有了这个名分,高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设立方志学本科专业,而不需要打上历史学(方志学)字样,申报方志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点也会变得相对容易,更重要的是方志学可以像其他学科那样得到一个稳定、健康、有序的发展。至于在现阶段缺乏官方名分的困境下,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校地协同的办学形式予以弥补,这也是目前环境下打破方志学专业发展困境可行的办法。

首先,校地协同可以弥补师资的不足。为弥补师资不足及大学课堂教学与修志工作实际需求存在脱节的现象,可以外聘一些长期在修志第一线、有实际修志经验并有一定理论功底修志工作者为大学兼职教授,到高校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以补充课堂讲授方志学课程的不足。在研究生层面上,则可以聘请校外修志专家担任方志学硕士点或挂靠硕士点的兼职研究生导师,推行双师型导师制,主要指导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毕业论文的撰写。不定期的讲座和双师型导师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学校现有师资队伍建设的一种变相补充。

其次,校地协同可以推进高校方志学学科建设。教育部现在允许目录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所以理论上存在高校自主设立方志学硕士点的可能。但由于高校中从事方志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寥寥无几,且分散在不同高校,因此申报目录外增列二级硕士点即使有学校支持,也缺乏师资和研究成果。但如果与高级职称人员较多、研究实力雄厚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合作,则申报目录外增列二级硕士点就有希望。

再次,校地协同有助于方志学专业学生教学实践的落实及可持续发展。学生短学期、寒暑假的教学实践及毕业实习,只有谋求校地协同,尤其是与学生原籍地的方志办建立合作关系,由他们接收学生参与实习,使教学实践真正落到实处。条件成熟的可共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实习基地,实现实践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如宁波大学方志学专业(方向)历来十分重视课堂教学与课外修志实践的结合,近几年来先后与宁波市及其鄞州区、江北区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黄浦区、松江区、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地方志工作机构合作,建立起本科生教学实习基地。^①为避免因时间短而流于形式,影响实习效果,学校还对教学计划作出部分调整,将学生毕业实习提前至大三暑假,便于与大四实习期联合使用,保障了实践教学的实施,真正做到教学与实践并举。

最后,校地协同还可以为方志学专业发展带来诸如资金、知名度、影响力、学生就业等方面的帮助。校地协同的形式除了前述补充师资、参与学科建设、落实实践教学外,还包括与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共建方志培训中心和方志理论研究基地,承办各类非学历教育社会培训,合作进行地方志的开发和研究等方面。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大学的方志社会培训、宁波大学非学历

^① 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江西省方志馆、上海市奉贤区地方志办公室也是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方志学研究方向硕士生的教学实习基地。

教育方志培训。又如通过校地协同,鼓励方志学专业师生主动“走出去”,与各地方志工作机构合作进行地方志的开发和研究,包括编纂各类志书,参加志稿研讨、评审会,进行旧志整理开发,共同开展课题申报、研究等。上述活动不仅可以加强高校与各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联系,扩大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创收,加对方志学专业的资金投入,对毕业生就业也不无裨益。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人才队伍素质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事业发展就能上台阶、上层次。”^①但目前修志人才梯队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专业人才匮乏,一些参加过首轮修志、后又返聘参与第二轮修志的老专家、学术骨干已年逾古稀,新加入修志行业的工作者不少属于“半路出家”,即使是新近考入公务员队伍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大都也未受过专业系统培训,对方志学有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规划纲要》称:“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人员素质亟待提升。”如何提高方志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已成为进一步提高地方志书质量、推动这一工作不断发展迫切需要完成的课题。对现有修志人员施以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和继续教育固然是加强修志队伍建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学历教育同时是必不可少的,它有着短期培训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正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以校地协同为纽带,尽快形成和确立方志学学科,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进方志学学历教育在国内高校的发展,形成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国民教育体系。只有实现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和在职培训的同步发展,才能培养出多层次的合格的方志学人才,确保方志事业后继有人,永远保持雄厚的实力和蓬勃发展的势头。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本文责编:詹利萍

《紫阳县志(1986—2010)》出版发行

2018年4月,紫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紫阳县志(1986—2010)》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安康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出版发行的第二部县志。

紫阳县第二轮县志编纂工作于2009年7月启动,历经8年,八易其稿,于2017年3月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审查通过,2017年12月交付方志出版社,最终形成27编、110章、412节、107.6万字的定稿,并于2018年4月出版发行。该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紫阳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在改革开放25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新探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既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又不避讳探索创新中的失误教训。

(陕西省紫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① 王伟光:《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5期。